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

崔军锋,杨丽平^①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 文章主要探讨抗战中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问题。按照双方当初达成的协议,八路军作为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其待遇应与其他国民党军相同,但实际上除了编制内的军饷和被服外,国民政府极少给八路军补充武器,仅给予必要的弹药。随着八路军的发展,蒋介石更担心其势力尾大不掉,1940年前即停止对八路军的武器弹药补充,不久又停发了八路军的医疗等物资和军费。虽然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较少,也不积极,但这些军械装备对抗战初期的八路军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帮助。探究抗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问题,可以作为考察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个独特视角。同时,探究此一问题,也可借此明了共产党是怎样在抗战艰难的情况下一步步壮大,最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对抗战史的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的指导,必须要用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

[关键词] 国民政府; 八路军; 抗战; 军械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6-0059-09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的不断深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西安事变后,中共与国民政府开始进行和谈,期间围绕中共武装改编的规模、编制、领导权、给养等问题进行重点谈判。因双方要求相差过大,直到七七事变前夕仍未能就一些关键问题达成一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性的抗战开始,战势的迅猛发展迫使蒋介石做出让步,于1937年8月正式发布命令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后红军接受改编。按照之前谈判的协议,八路军的待遇应与国民党军相同。在此情况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对八路军的军械物资进行了一定的补充。

目前学界对于抗战史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产生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不过现有研究多集中在政治方面,在军事层面的论著虽也为数不少,但对于抗战军队军械尤其是中共军队军械方面的研究还是较薄弱。

八年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主力部队是由长征到陕北的红军改编的八路军。关于八路军的军械来源我们通常谈到的是作战缴获、兵工生产。以作战缴获为例,八年对日伪作战,八路军共缴获各类步兵枪械455068支,各种机枪7499挺,此外还缴获各种炮1288门^{[1]356},而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八路军发

展到约103万人^{[1]3},缴获的装备足以装备八路军半数以上部队,由此可见作战缴获对八路军军械补充之重要性。

而长期以来涉及八路军军械问题的文献记载大多也在作战缴获和兵工生产上。如《八路军文献》^[2]、《八路军表册》^[1]、《八路军回忆史料》^[3]、《聂荣臻回忆录》^[4]等关于八路军的史料大都会将作战中的缴获列出,也会谈一些兵工生产及民间收集军械的问题,但不多。关于八路军军械军工生产的研究最多也最完善,如《八路军》^[5]、《八路军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6]、《八路军山东纵队史》^[7]、《中国兵工企业史》^[8]及丁志远的《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兵器工业》^[9]、曹敏华的《论抗日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建立与兵工企业之运作》^[10]、夏明星的《军工奇才刘鼎》^[11]、杨尚军的《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军工部》^[12]等文。以上成果基本上已将八路军的军工生产状况研究得较为透彻。

但根据国共的协议,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是有责任为八路军补充军械的,那么,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究竟补充了多少军械给八路军?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还很缺乏研究。在资料性的文献中往往只有寥寥数笔提及,学术成果中也只有刘中刚的《抗战初期八路军的给养问题是如何解决

[收稿日期] 2015-10-28

[作者简介] 崔军锋(1978-),男,河南鹤壁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①北京米尔网络技术公司编辑。

的》^[13]、葛美荣的《蒋介石给中共军队发了多少军饷》^[14]、唐振君的《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任务》^[15]等文对这一问题有一定提及,但不甚全面。所以说,关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军械补给的研究还很缺乏。研究这个问题,可以作为考察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一个独特视角。同时,探究八路军在抗战时期的军械来源问题,也可借此考察共产党是怎样在抗战艰难的情况下一步步壮大,最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

基于此,笔者将本文定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一番探讨,以还原历史真相,对这一段史实做出公允的评价。

一 八路军军械问题的由来

(一) 国共谈判与红军改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和国民政府就联合抗日及红军改编问题进行和谈,谈判在1937年上半年进行,期间双方围绕红军改编后的规模及领导权问题争论不休。七七事变爆发后,双方终于达成了改编的一致性。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时却未得到中央政府的军械补给,鉴于自身军械状况难以适应对日作战,中共向国民政府提出自己在军械上的要求。

从1937年2月开始到1937年9月,围绕国共合作,中共和国民党先后进行了多次谈判,其中红军主力改编是重要议题。蒋介石提出的方针是“编共而不容共”,早在1936年国共进行非正式接触时,蒋介石就提出“中共军队最多编为3000人至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16]⁵¹在国共第一次正式谈判期间蒋仍然“坚持最多允许(红军)编三个师,每个师只准编9352人,总共不超过3万人”^[17]⁴⁵。同时蒋强调改编后的红军须无条件服从南京政府的领导。

很明显,国共谈判初期双方的意见相差甚远,围绕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红军改编后的领导权、红军改编后的军饷待遇、陕甘宁政府的合法性等,国共代表展开多轮交锋。

但时局的发展打破了国共谈判的节奏,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7月8日,中共发布抗日通电,号召全民族联合起来一致对日。

仅仅一个多月后日军进攻上海的“八一三”事变爆发,南京方面急迫想要红军出师抗日,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做出让步。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每师15000人”^[18]。8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命令,朱德为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115师,师长林彪;以红二方面军为主编成120师,师长贺龙;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129师,师长刘伯承;八路军总部及下辖3个师人员共计4.6万人^[18]²⁹³。

(二) 八路军军械的窘状与要求

作为一支长期在困境中作战的军队,红军(改编后为八路军)的军械状况可谓残破。根据埃德加·斯诺的记载,当他在红军中考察时,“他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武器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弹药是从敌军那里夺来的”^[19]。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工作实际上是在1937年的七八月份才完成,此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即将踏上战场的八路军仍使用红军时代缴获的武器装备,且弹药极少。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下辖三个师,分别是115师、120师、129师。笔者查询到除115师外其余两师在开赴前线前的军械状况。

八路军120师全师开赴前线的有8000余人,根据周士第日记记载,120师共有迫击炮4门,重机枪35挺,轻机枪143挺,花机关枪1挺,步马枪4091枝,驳壳枪788枝,手枪91枝,手提式枪67枝,马刀2把,刺刀117把,各种子弹276955发^[5]²⁶。

八路军129师奔赴战场9000余人,“仅有步马枪4136枝,自来德枪539枝,手枪93枝,花机关3挺,重机枪29挺,轻机枪93挺,手机枪72枝,迫击炮6门,刺刀55把,手榴弹204个,步马枪弹43012发,自来德弹2872发,手枪弹6051发,重机枪弹23222发,轻机枪弹27361发,冲锋枪弹310发,迫击炮弹67发,各种子弹共计102828发。”^[20]¹⁴

综合来看八路军这两个主力师的军械状况便可发现以下问题:

第一,枪械成分复杂,型号众多,这将导致枪械在弹药补充、零件配置方面面临很大的困难,加大了后勤补给及维修的困难,不利于军事作战行动。

第二,子弹奇缺,120师、129师合计子弹是379783发,平均每人约22发,每枪约37发,这些子弹如果在大兵团作战中恐怕支撑不了一个攻防战役。

第三,严重缺乏重武器,两个师竟没有一门山炮,迫击炮不过10门,平射炮、机关炮也无,这将导致部队严重缺乏攻坚火力,在正规作战中很难与敌正面抗衡。

第四,近战武器缺乏,两师刺刀合计172把,不

得不以传统的红缨枪、大刀等作为补充,这说明八路军即使是进行白刃战也无利器可用,不得不以血肉之躯阻挡敌人。

根据1937年6月25日军委主席团要求彭德怀、任弼时制定的编制表,红军改编后“每师14000人上下,每团等于过去红军的师,每营辖四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团属迫击炮连或排。每个步兵连配轻机枪6挺,编制160人。”^[21]

那么以轻机枪为例,八路军每师执行2旅4团编制,每团下辖3个营12个步兵连,如以每连6挺轻机枪为标配,则每团配备给步兵连的轻机枪就得72挺,每师就是288挺,这还不包括机枪连所需的配额。而从八路军实有武器来看,120师全师有143挺轻机枪,129师全师仅有93挺轻机枪,仅仅连步兵配属的重要火力支援武器都远无法满足,其军械窘状可见一斑。

在国共谈判开始后,红军获得来自国民政府的一些军费,如1937年2月领到的50万元善后款项,到1937年8月,国民政府每月向红军提供约30万元的款项用于军队维持^[14]。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谈判完成时,双方达成的协议是:国民政府核定每月拨给八路军军费63万元^[14]。但1937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对中共武装的武器装备、军用物资的补给却为数寥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前仅在1937年夏季得到4.5万套军装的补给,至于枪支弹药则没有领到。

而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时全面抗战已经爆发,战事的紧张使得八路军在未领到军械补给时便已经开拔奔赴前线。此时八路军的武器装备现状我们在前文已有介绍。

中共领导层对自己军队的军械状况有切身了解,作为中共后勤战线主要负责人的叶季壮曾称“武器弹药是杀伤敌人的主要工具,没有它便不能作战”^{[22]第1册:18}。早在1937年7月28日中共中央便特意嘱咐在山西与国民党交涉的彭雪枫要求“刺刀、工具、子弹、手榴弹等之补充”^[219]。

1937年8月9日毛泽东亲自致电彭雪枫列出了红军所需的五类十九种物品的补充。“同日,毛泽东电复彭德怀、任弼时,告知他们在其所开列的清单外,又增列步枪5000支,小钢炮40门(炮弹5000发),皮衣、皮帽、毡鞋各4.5万件(双)。”^[13]8月1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雪枫强调“红军技术与装备极其贫弱,也要使他们知道,并照昨电开五类十九种物品要求补充,否则与强敌作战是很难收效的”^{[2]17}。

两日之内毛泽东连发三封电报要求军械物资的补给,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此时中共中央对于军械补给的急迫心情。毕竟八路军将要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队,日本作为当时是亚洲综合国力最为强大的国家,其军队不仅训练体系完善而且武器装备相较于中国军队拥有绝对优势。对于从未与日军交锋过的八路军而言,究竟能不能在战斗中击败敌人是萦绕在中共领导人头上难以回避的问题。武器装备作为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战斗的成败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如能争取到来自国民政府方面的军械补给对于装备简陋、缺枪少弹的八路军而言自然是一件大好事。

二 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

尽管装备简陋,缺少必要的武器装备,但改编完的八路军还是踏上了抗日的征途,不过中共并未放弃向国民政府要求军械补给的努力,处于种种考量,国民政府及地方实力派在抗战初期给予了八路军一定的军械补充。这些补充在抗日战争不同的阶段,有其各自的特点。

(一)太原失守前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

1937年8月,毛泽东指示在太原的彭雪枫与阎锡山进行对八路军军械物资补充的交涉,长期统治山西的“山西王”阎锡山却表示“小钢炮、刺刀、水壶、十字镐、七九子弹等恐一时难以办到”^{[23]第3册:53},因此山西方面的军械品难以迅速得到。而事实上,阎在山西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工业,连一些子弹都没有说不过去。

8月19日彭雪枫向毛泽东表示我们应当“要求南京补充之军需首为炮、枪、刺刀、水壶之类”^{[23]第3册:59}。对此南京国民政府方面反应较为迅速,第二天,也就是8月20日,身在南京进行交涉的叶剑英便领到了“七九子弹30万发,七九机弹20万发,驳壳弹20万发,迫炮弹620枚,手榴弹1.5万颗”^[14]。这批军械物资通过西安转运至延安方面,这是八路军从南京国民政府方面获得的首批武器装备的补充,虽然都是弹药,但已经可使八路军支撑一段时间的作战,70万发的子弹补给量几乎已经是八路军120师和129师实有弹药数的近两倍。

这里有必要提到的一个机构就是八路军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是抗战开始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国统区重点城市设立的办事机构,抗战期间八路军曾在南京、武汉、西安等主要城市设立办事处。其主要职责是国共关系的协调及申领军饷及军用物

资。因此八路军从国民政府方面申领的武器装备及其他军用物资大都通过八路军驻各地的办事处来进行转运、统筹。

1937年8月2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式下达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8月25日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通电就职,此后115师和120师即向山西进发堵击日军。

进入9月份,山西战局对中方已极为不利,山西王阎锡山的晋绥军在与日军的作战中损失惨重,华北日军一路从大同进入山西,一路从石家庄向太原进发。心急如焚的阎锡山急切盼望八路军能够尽快到达前线以挡日军攻势。为了能让八路军尽早参战,阎锡山表示要“送我军七九子弹五十万发,并中正子弹五十万发,冲锋机关两百支”^{[23]第3册:68}。这些武器弹药由彭雪枫领导的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申领,分发给已经到达太原附近的八路军部队。另外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的一个排的警卫战士还向阎锡山申领了部分山西造的手提机关枪^{[23]第3册:100}。

9月19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张闻天并转叶剑英,表示“南京原发子弹50万发,后加20万发,阎锡山发50万发,黄绍肱发30万发,共150万发。120师带不完,准备留129师东来补充”^[14]。

120师带不完,那么120师带了多少?笔者在《120师供给部抗战二周年供给工作总结》一文中查询到120师“晋西北时期由总部发来步机枪弹20万发,迫击炮弹300发,俄枪弹5万发”^{[22]第4册:174},这批弹药可能就是南京方面发放的弹药。

对于即将对日作战的八路军而言这批弹药可谓雪中送炭,它确保了八路军在对日作战初期能有较充足的弹药保证,为八路军抗战初期作战的获胜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9月中旬得到国民党方面一定补给的八路军115师和120师抵达战区,129师也已出动,八路军部队活动于山西灵丘、涞源和河北平山、行唐一带,伺机打击日寇。

战机很快就到了,9月25日八路军115师主力于平型关地区伏击日军,一举歼敌1000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寇。而首战大胜的八路军声威鹊起,为晋绥军和中央军所侧目。毛泽东趁机要求程潜和阎锡山“补充我军步枪三千至三千五百枝,机关枪三十至三十挺”^①这批军械到底给没给无相关资料证明,但根据115师的供给报告该师“除直接在我总部领用外,并在山西军及中央军还补领了一部分经费粮弹与服装”^{[22]第3册:125}。可见八路军部队至少也是得到一部分军械补给的。

此时,随着八路军不断扩大作战区域,各师先后取得了战果,但因与日军武器的差距还是造成了许多损失,如129师夜袭阳明堡机场,因缺少必要的刺刀、大刀导致在肉搏战中付出了本可避免的损失。

八路军各师虽然奋力御敌,并取得一定战果,但无奈中国军队难以抵御日军的凌厉攻势,因而战局的发展对中方日趋不利,11月份日军第五师团和蒙疆兵团攻占山西太原。

太原是阎锡山的大本营,是其经营山西数十年的本部所在,抗战爆发后阎在太原附近囤积了大批的军用物资,此前阎锡山为促八路军早日参战,曾提供了一些武器弹药给八路军。但这只是阎所屯物资的极少一部分,在太原即将失守前夕,阎思量晋绥军已无法转运太原附近的物资,不得不将遗留的大量弹药物资“送”给八路军。

关于这批弹药物资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没有定数,但可以通过两则电报初步了解,“一是11月13日,周恩来、彭雪枫、叶季壮、杨立三给毛泽东、张闻天、萧劲光的电文中称,太原失守后,晋西形势紧张,现有约30余万军需品需紧急后运”^[13],“11月16日,周、彭、杨再电毛泽东、张闻天、萧劲光,称大宁已送平渡子弹30余万发。”^[13]可见此批物资不在少数。

因日军在作战中经常使用毒气,所以八路军还得到了国民政府一定量的防毒面具补给,1937年8月26日蒋介石曾指示何应钦“速发第八路军代表叶剑英防毒面具六千颗”^[14]。11月19日彭雪枫等人致电刘伯承(129师师长)“前后已由临汾转博爱送你的物品两批,第一批棉大衣、防毒面具、西药,这两天可到博爱,乘汽车转长治线,请派人迎接。第二批地图七捆,防毒面具十七箱,内有六箱是交聂荣臻部收”^{[23]第3册:79},这表明收到的防毒面具已经开始下发部队。

进入12月份,山西大部已经被日军攻占,八路军已经不能在山西领取军需物资,转由西安领取。在此情况下,山西最大的三股抗日势力——阎锡山的晋绥军、卫立煌的中央军和八路军开始探讨划分游击区的问题,期间提到可以“发一部分旧枪、西药、子弹及通讯工具给我们”^{[23]第3册:86}。虽然是讨论划分游击区的问题,但中央军和晋绥军在山西抗战中的主力地位却悄然被八路军所取代。此时国共合作尚且较好,在对日作战问题上,还能进行合作,八路军有时甚至可以指挥部分中央军、晋绥军对日作战。

从八路军1937年8月奔赴前线到1937年11

月太原失守的这段时间内,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主要是阎锡山)对八路军的军械补给应该说还算大方,基本保证了八路军在这一阶段对日作战的弹药消耗。不过也应看到,国民党方面绝少补充八路军枪械,而只是补充弹药,其意图还是想让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被消耗而不希望八路军用枪支去扩充部队。阎锡山之所以能给八路军较多的军械补充主要还是寄望于八路军能保住其在山西的地盘,太原失守后,阎锡山退守晋西南一隅,八路军就无法再从阎那里得到军械补给。

(二) 武汉失守前国民政府对八路军的军械补充

1938年,八路军已经由出师时的4.6万人发展到了十多万人,实力扩充了3倍有余。而来自国民政府的军械补充却越来越不及时。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在1938年1月与蒋介石一同由洛阳到汉口,回来后表示“蒋对人、枪、钱都抓得极紧,不愿我军扩大,不肯发枪、加钱”^{[23]第4册:45},而八路军对日作战的消耗却很大,尤其是武器的损耗和弹药的消耗。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国民党爱国将领给了八路军很大帮助。其中,卫立煌将军对八路军军械的补充帮助较大。如,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于1938年3月取得了午城、井沟战斗的胜利,但获胜的同时,自身也“消耗机步枪弹十六万余发,发掷弹五千余枚。现该旅轻重机枪每挺仅有弹百余发,步枪每支仅有二十余发,每人手榴弹一枚尚不敷”^{[2]157}。为此请求卫立煌补充“七九步枪弹十五万发,手榴弹五千个,以便继续战斗”^{[2]157}。而此时卫立煌刚刚自韩信岭败退,途中又被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相救,为表谢意,“卫立煌送给六八六团十万发子弹”^[24]。

但事实上此时国民政府本意是不愿意提供八路军武器,而“仅负责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粮食、被服的费用和必要的弹药”^{[2]169}。卫立煌送八路军弹药完全是因为他认为八路军是抗战的队伍,他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八路军提供帮助,而且这个帮助也仅仅限于弹药。

1938年4月卫立煌访问延安后回到西安的第二天,因受共产党民族大义的影响,他又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下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发”^{[25]89}。前面提到,由于此时国民政府原则上是不向八路军提供大量武器弹药的,卫立煌的手谕使得当时负责下发弹药的十四集团军兵站分监臧海澜很为难,卫立煌表示,在对日作战上“十八集团军打得很好嘛,我们就

要充分供给”^{[25]89},在卫的催促下这批弹药得以及时发出。而汉口国民政府方面其实并不同意这批弹药的发放,只是当汉口方面不同意批发一百万发子弹的电报送到西安时,这批弹药已经送出,为时已晚。

据当时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回忆,卫对八路军的帮助还不仅于此,卫曾对他说“在韩信岭战斗最激烈的日子,日军从东阳关进入潞城,眼看晋东南快保不住了,他就通知十八集团军派人把十四集团军在临汾、运城的军火和其他物资全部运走。”^{[25]112}当时“把洪洞、赵城、临汾等五个县的很多农民和四五百辆大车都调来了,把东西都运走了。”^{[25]112}从“四五百辆大车”即可看出此批军火物资不在少数,而卫立煌的十四集团军又是中央军精锐,军火物资质量也应较为上乘。

卫立煌出于民族大义,违背国民政府意愿向八路军提供大量弹药对民族抗战是有功劳的,对八路军的作战帮助较大,展现了一名爱国将领的风范。

随着南京的陷落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中共相应设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负责针对国民政府的主要事务,当然也包括军械弹药的申领。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领得军械物资后一般都是先转运西安,再运到延安。1938年5月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领得一批军械物资计“方形药包两万、速燃火索五千尺、缓燃火索五千尺、六号雷管五十个”,后又有“方形药两千、黑烯三百公数、雷管五百、速燃导火索一千尺、缓燃导火索五百尺”,还有“大刀三千把,刺刀两千把”^{[23]第4册:77}。而在此之前“武汉办事处派廖其康到湖南衡阳兵工厂领取三箱武器,随即送给八路军”^{[23]第4册:181},这批武器可能就在上述之列。

这些领到的军械物资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负责筹划运输,物资运抵陕北根据地后,再给八路军各部队统一分配。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军械物资的转运都循此例,1938年9月底10月初,日军以五万兵力合围晋察冀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但“我火力薄弱,虽能一再打垮敌人,难于迅速歼灭,敌又施放毒气,军民中毒者不少,前后总计我伤亡已在三千人以上”^{[2]239}。在晋察冀军民苦战之际,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直接为其送去子弹三十万发^{[23]第4册:185}。这批军火成为晋察冀军民赢得胜利的物质保证。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撤销,在其存在的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内,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共领取炮 20 多门,长枪 400 多枝,机枪 200 多挺,驳壳枪 112 枝,大刀 3000 把,弹药 1300 箱,黄色炸药 300 多吨^②。这批军械除少量供给新四军外,大部供八路军使用。

这些物资的申领是十分艰难的,因为国民政府并不情愿为八路军提供武器和弹药,八路军办事人员往往付出很大努力却只能得到申领军械的很小一部分。如当武汉办事处人员按规定向国民政府提出要驳壳枪 2000 支,结果只给了 200 多支;在得知 1938 年苏联援助机枪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提出要 1000 挺,结果勉强才给了 100 余挺^{[23]第4册:144}。而在更多的情况下这样的要求是得不到回应的。

1938 年 10 月 23 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电蒋介石,“请予成立总部直辖炮兵团,并请发重炮若干门,以便训练与参加攻城战斗”,同时表示“八路军远留敌后作战,弹药资材最感缺乏。现平汉路断,交通运输更感困难,请准予一次发给步枪子弹六百万发,半年用的三个军卫生、通讯及炸药材料,以便坚留敌后持久抗战”^{[21]246}。但此时,随着八路军的扩大,在河北、豫北等地八路军已经与国民党军石友三等部发生摩擦,甚至流血冲突,在此种情况下八路军的发展更引起了蒋介石的警惕,不仅时常停发八路军军费,而且连弹药也极少补充。前文朱德申请一次发给子弹六百万发,但“仅批二十五万发”^{[21]343}。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八路军想要得到军械物资的补充更为困难。此时,华北八路军已经发展到了十二万人,八路军部队不仅经费紧缺,且弹药不足的状况也不断在各根据地蔓延开来。

处在困境中的八路军被迫在“晋东南、五台山、山东有计划的建设军事工业,收集弹壳,自造子弹、手榴弹,及注意购买上述机器、铜铁及其他原料,求得仿造轻机关枪,质量必须精确”^{[21]343},但军事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在敌后极端条件下是相当困难的,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武汉失守前的这段时期,总体而言国民党方面对八路军补充了相当数量的军械,而且在军械申领方面八路军还得到了国民党部分爱国将领的大力帮助,但国民政府却对八路军的发展壮大日益警惕起来,从而使得军械的申领日益困难,常常领到的数量仅仅只是申领数量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

(三) 武汉失守到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军械

1938 年 10 月,日军攻占武汉后,暂时停止了对国民党方面的大规模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后日军将在华重心逐渐转移到华北,对八路军根

据地的扫荡更加频繁,八路军各部无日不在苦战当中,弹药的消耗量极大。

据统计,1939 年 1 月到 7 月八路军各部共计消耗步机枪弹 10950000 发,自来德手枪弹 566800 发,迫击炮弹 9950 发,山炮弹 1840 发,手榴弹 156000 个,而与此同时由国民政府领到的数目为步机枪弹 1900000 发,自来德手枪弹 300000 发,手榴弹 40000 个,迫击炮弹 14000 枚,麦德森两公分炮弹 500 枚^{[21]373}。对比如表 1:

表 1 1931 年 1 至 7 月份八路军领得及消耗弹药表

项 目	步机枪弹	自来德手枪弹	山炮弹	迫击炮弹	手榴弹
领到弹药量	1900000	300000	500	14000	40000
消耗弹药量	10950000	566800	1840	9950	156000
两者之比	17.35%	52.76%	27.17%	140.7%	25.64%

由表 1 可以看出,以上五项,除迫击炮弹补充大于消耗外,其余步机枪弹、自来德手枪弹、手榴弹、山炮弹补充均小于消耗,其中差额最大的步机枪弹,领到的量仅为消耗量的六分之一。如此大量的消耗得不到相应的补充,八路军“常因弹药困难,火力不足,往往不能结束战斗,实为莫大损失”^{[21]373}。

1939 年 6 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给八路军的任务指示中特别强调要“节省财政、弹药、医疗、通讯材料等”^{[22]第1册:8}。到 1939 年 8 月,八路军“弹药已万分困难”,而“各方战况更形激烈,需用弹药更为急迫”^{[21]373}。

但此时的时局和国共形势已然发生变化,1939 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反共性质的决议。国民政府对中共及八路军的封锁打击已从武器延伸到经济,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史专家莱曼·范斯莱克称:“中央政府给边区预算的补助于 1939 年中断了,边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贸易几乎陷于停顿,这对一个许多基本用品不能自给的地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26]下卷:754}

在中央政府的默许下,华北山西、河北两地的国民党阎锡山部、朱怀冰部、石友三部蠢蠢欲动,与八路军摩擦甚多。他们被中共方面称为“顽军”,意即国民党顽固派军队。

在前线浴血抗日的八路军得不到国民政府方面的军械甚至经费补充,而故意制造摩擦的石友三等部却能得到蒋的军援。1939 年夏天,蒋介石“特地发给他(石友三)汉阳造步枪八百枝,马克沁机枪三十挺,步枪子弹一百万发”^{[20]167}。而石友三部向来以反共而臭名昭著,蒋此举无疑是对石友三反共的

莫大支持。

1939年12月,顽军对八路军的进攻进入高潮,是为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了打退顽军,八路军在1940年1、2月份开展了反摩擦战役,一举击退顽军,粉碎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但八路军所付出的代价也很大,除了人员的伤亡外,武器弹药的损耗也尤其严重。

1940年8月百团大战爆发,华北八路军除山东地区部队外大都参加了对日伪据点的进攻作战。激烈的战事使得八路军有限的军械弹药又很大地消耗,仅129师在作战中就消耗各种子弹725324发、损失各种子弹45891发、损失及损坏各种枪支1756支,此外还消耗了大量炮弹及手榴弹^③。

如此大的消耗量确实让八路军感到吃不消,其实当时没有参加百团大战的八路军山东部队同样感到弹药缺乏,1940年9月八路军山东纵队称“已将平均计算一旅每个战士多者十粒,少者五粒。近来屡因弹药缺乏影响战斗甚大,得手之歼灭战因子弹打完不能解决战斗。”^{[22]第3册:58}

但陷于军械困境中的八路军并没有能得到国民政府的同情,蒋介石看到的只是八路军实力发展的情况。不愿坐视八路军一直壮大下去的蒋介石在1940年12月永久性地停发了八路军的物资和军费。

在这个阶段,八路军从国民政府方面申领的军械弹药数量随时间推进而递减为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蒋介石不愿看到八路军的发展壮大,早在1939年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蒋就有试探八路军实力的意图,其指使顽军与八路军发生冲突,使得八路军在与日军和顽军的作战中受到双重消耗。因此其对八路军申领军械物资更是百般为难,最后终于停发了八路军的军械物资。

因为八路军无法从国民政府那里得到军械补充,1940年后八路军不得不努力开辟其他的军械来源渠道,大批的敌后军工厂所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同时在对日作战中八路军更加注重弹药节省和对敌缴获。

三 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军械补充的特点

通过考察抗战时期蒋介石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军械补充的一些史实,我们可以从中归纳出这一时期国民党方面对八路军军械补充的一些特点。

(一)从时间上看,国民政府补充八路军军械的时间较短。中国人民全面抗战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共持续了8个年头。抗战八年,作为国

民革命军序列内的八路军,仅仅在1937年8月至1939年下半年的约两年时间得到过武器弹药的补充^④。而在其余的6年间则未得到政府一枪一弹的补充,即便是在有补充的两年中,国民政府前后的态度与供给量也不一致,前期其考虑的是尽快使八路军出师抗日挽救危局,比较痛快地补充了一批弹药,但当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逐渐发展壮大时,就开始敷衍甚至置之不理,补充量也日益减少,直至停止供给。

(二)国民政府补充八路军的军械主要以弹药和炸药为主。1937年8月至1939年8月,关于国民党方面提供给八路军的弹药和炸药,有明确记录的共计子弹560万发,另500箱;手榴弹30.05万个,另200箱;各种炮弹15120枚,另300箱炮弹;还有数百吨炸药。应当说,这批弹药对八路军的作战帮助是较大的,抗战初期,八路军部队战绩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弹药相对充足,而此时八路军在作战中的缴获尚少,自身的军工生产也才刚刚起步。

(三)国民政府很少补充八路军枪支及火炮。有明确记录的步枪及轻重机枪不过千枝,重武器不过二十余门炮,其余为数千把大刀和刺刀。按照当时军队的编制,这批枪械和炮仅能够装备一个小规模的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而八路军仅在1940年就已经能够发动百团规模的进攻作战,仅凭国府补充,八路军甚至连日军一次大规模的扫荡都撑不过。国民政府之所以不愿补充八路军枪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不希望八路军发展壮大。

(四)国民政府原则上不愿补充八路军军械,即便补给,很大程度上也是被迫而为,敷衍了事。倒是国民政府战区内的部分将领出于爱国之心对八路军军械的帮助较大。例如当时国民政府第二战区长官卫立煌便利用职务之便为补充了八路军相当数量的弹药及军械物资,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物资的拨放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所不容的。

四 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军械补充的评价

关于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对八路军补充的军械,要从两方面去认识。

一方面,应该承认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八路军补充了一定数量的军械,这点毋庸置疑,而这些军械无论在八路军的对日作战还是其发展上都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仅就子弹而言,据徐焰少将研究,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共消耗子弹四千万发,我们根据统计八路军有明确记载的领得来自国民政府方面的弹药就达约600万发,这在当时算是一个较大的数目,

而不像有些文章一笔带过的“少量”。这些弹药在八路军抗战的前两年发挥了很大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弹药的补充,八路军在对日作战中将更加艰难,八路军也难以很好地打开抗日的局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白,政府为军队补充军械是其本职,但国民政府却仅仅为八路军提供了两年的军械补充,而且在很多时候都是被迫为之,后来则完全停发八路军军械。国民政府的这种行为使得八路军后来的作战异常艰难,使其在作战中经常以白刃战作为主要方式,无形中加大了八路军的伤亡,削弱了抗日军队打击敌人的实力。

毫无疑问,我们对抗战史的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的指导,必须要用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本文回顾、追溯了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对八路军军械补充的历史过程,无非是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告知历史真相。而并非刻意去纠结、追究八年抗战过程中的功过是非、谁对谁错。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一样,是正义与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它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者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今天,两岸关系走到了历史的关键路口,中国梦是民族振兴梦,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梦。两岸同胞应该相互扶持,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宗教、不分地域,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都参与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来,早日实现国家和平统一,从而促进共同的中国梦早日成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两岸一家亲。

注释: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八路军军械》,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9页“毛泽东、张闻天关于华北作战的战略补充意见致周恩来等电”。程潜当时为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另“三十挺至三十挺”原文如此。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领取和筹集经费物资统计表”。另据李志宽《八路军总部和驻各地办事处的关系和作用》提到弹药1300箱的构成为子弹500箱,炮弹300箱,手榴弹200箱,方形炸药200箱。

③ 根据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5册,金盾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一二九师百团大战武器弹药与消耗损失与损坏统计表”整理。

④ 1937年8月,叶剑英首次领到南京方面的弹药;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有关

军队与民兵武器问题”一文中提到“国民党已两年未发一颗子弹,将来发给的可能性也很小”,由此判断国民政府大约在1939年下半年中断对八路军军械补给。原文见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1册,金盾出版社,1991年版,第538页。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 八路军表册[Z].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 八路军文献[Z].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编审委员会. 八路军回忆史料[Z].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 [4] 聂荣臻. 聂荣臻回忆录[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 [5] 岳思平. 八路军[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 [6] 编辑部.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暨山东军区战史[M]. 济南:黄河出版社,2005.
- [7] 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 八路军山东纵队史[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 [8] 李滔,陆洪洲. 中国兵工企业史[M]. 北京:兵器工业出版社,2003.
- [9] 丁志远.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兵器工业[J]. 兰台世界,2013(4):26-27.
- [10] 曹敏华. 论抗日根据地兵器工业的建立与兵工企业之运作[J]. 抗日战争研究,2009(1):111-122.
- [11] 夏明星. 军工奇才刘鼎[J]. 党史纵横,2006(4):32-36.
- [12] 杨尚军. 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军工部[J]. 党史文汇,2014(4):43-49;(5):58-64.
- [13] 刘中刚.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给养问题是怎样解决的[J]. 党史纵览,2012(4):10-15.
- [14] 葛美荣. 蒋介石给中共军队发了多少军饷[J]. 文史博览,2013(6):54-55.
- [15] 唐振君. 八路军办事处的主要任务[J]. 文史月刊,2013(4):27-30.
- [16] 丁家琪.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的谈判斗争[J]. 军事历史,2009(4):49-52.
- [17] 刘家国. 红军改编前后国共两党谈判斗争评述[J]. 军事历史研究,2003(3):44-51.
- [18] 张宪文. 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19] [美]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M]. 北京:三联书店,1979:234.
- [20] 李达. 抗日战争中的一二九师[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1] 孙琦. 关于八路军编成人数问题[J]. 军事历史研究,1995(4):71-76.

- [22] 后勤学院学术部历史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1.
- [2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 [24] 司徒慕文.八路军三大主力—115师征战纪实[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
- [25] 赵荣生.回忆卫立煌先生[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 [26] 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The Weapon Supply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the Eighth Route Arm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CUI Jun-feng, YANG Li-ping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d the weapon supply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the Eighth Route Arm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agreement, the Eighth Route Army has the equal right with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rmy, their treatment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e other nationalist army. However, in fac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rarely provided weapons to the Eighth Route Army in addition to the necessary ammo, the pay and cloth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Chiang Kai-shek was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about its mightiness. In 1940, he stopped the replenish of ammunition to the Eighth Route Army, and stopped giving out medical supplies and military expenditures before long. Althoug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negatively offered less ordnance supplement to the Eighth Route Army, these weapons and equipment are greatly helpful to the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rough discussion of this problem, on the one hand, we can understand the second cooperation between CPC and KMT from one aspect.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also understand how the CPC was strengthened in the difficult situations, and achieved the success in the end.

Key words: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Eighth Route Army; Anti-Japanese War; ordnance